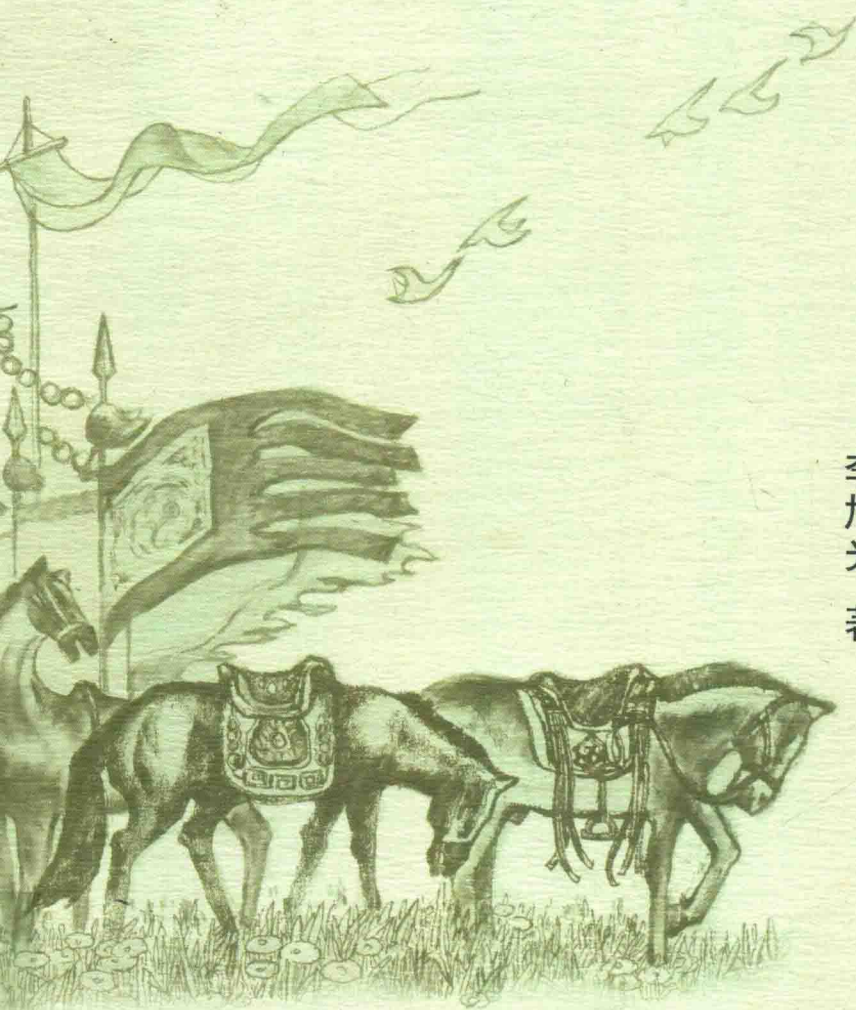


查干湖畔的辽帝春捺钵

李旭光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查干湖畔的辽东春林

李劫人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查干湖畔的辽帝春捺钵

李旭光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查干湖畔的辽帝春捺钵 / 李旭光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206-08164-4

I. ①查… II. ①李… III. ①国家制度 - 研究 - 中国 - 辽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2573 号

查干湖畔的辽帝春捺钵

责任编辑:刘 璐

编 辑:陈剑锋

封面设计:何天著

著 者:李旭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松原市宏海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0438-2856555 2231958

开 本:170mm × 230mm

印 张:19

字 数:21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206-08164-4

版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4000 册

定 价:48.00 元

苍桑岁月铸华章

阿汝汗

千百年来,这块凝重的土地到底历经了怎样的世事变迁?

岁月浩荡,珍贵的历史遗迹到底诉说着怎样的风云变幻?

我们将以何为依据,再现千百年前文明松原的辉煌盛况?

我们应从何处入手,记录千百年来松原文化的不朽传奇?

我们应该用怎样的笔墨、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情怀,为后人解读松原历史的亘古篇章?

从第一次看到旭光同志撰写的关于“春捺钵”的论述文章,我就知道,他会给出答案,果然。

以上这些我们曾经苦苦思索的问题,旭光同志用一部《查干湖畔的辽帝春捺钵》做出了最认真、最踏实、最执着、最完美的回答。在书中,旭光同志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大量翔实的举证,印证了古松原山山水水于辽代帝王眼中的无穷魅力,印证了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与荣耀。此书的著成,丰富了查干湖的文化内涵,对辽代的“捺钵”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和论述,对查干湖文化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补充和修订。

旭光同志的《查干湖畔的辽帝春捺钵》摆在案头,粗看,是一部集学术价值与文学价值于一体的专集,收录了作者历年来所有关于“捺钵”制度的感性与理性

的思考文字,以及精心收集和亲手绘制的图表。细细品读,才能体会到作者的执着追索,这其实是一部饱含着作者心血,由热爱、勤勉、执着和信念,凝聚而成的呕心力作。

近年来,随着全市繁荣发展松原文化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一系列全新的、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探究松原文化渊源、解读松原历史真相的论证文章相继问世。其中,由李旭光同志撰写的数篇辽金历史系列考证文章,从辽金历史与松原地域及松原文化的渊源入手,以清晰的脉络、深刻的剖析和翔实的举证,全面、客观、具体地论证了辽金文化在松原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意义,例举了辽代 9 位帝王举行春捺钵的地址、时间及与查干湖息息相关的政治事件,填补了“查干湖作为春捺钵主要驻跸地”一说没有翔实佐证的历史空白,成为我市近年来辽金文化研究工作的领军之作。在旭光同志和众多像他一样默默致力于松原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捺钵”文化为松原文化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已成为“松原文化”产生、形成、发展和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新一轮松原历史文化研究的全新课题。

所谓“春水秋山”,辽帝捺钵通常因季节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驻跸之地,其中,春捺钵的驻跸地与水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查干湖区域作为辽帝“春捺钵”主要驻跸地,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性和独特性,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并没有出版过翔实、系统的考证文章。近年来,旭光同志翻阅大量典籍,得出了如下论证:辽代历时 218 年,捺钵几乎贯穿辽帝执政的始终,而发生在松原查干湖畔的春捺钵活动至少绵延了近一个世纪。从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至天祚,计九位帝王,共举行春捺钵 153 次,其中,从圣宗太平二年(1022 年),首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辽帝到查干湖畔捺钵之后,此后的百余年中,作为主要的捺钵地,查干湖(古称“鱼儿泺”)在记载中共出现 28 次。近年来,在查干湖西岸乾安境内已发现四处“春捺钵”遗址,在查干湖北岸发现一处较大的“春捺钵”遗址群落。遗址的发现,再一次证实了辽代帝王神秘的“春捺钵”,与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和千丝万缕的联系。

辽帝为什么会选择在查干湖畔进行“春捺钵”?或者说为什么查干湖在辽帝

捺钵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地理位置的优势。因为位于查干湖东面的塔虎城(辽长春州)是辽代的军事重镇,也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其近年出土的大量铸币及器皿等文物可以推测,当时塔虎城的金融业和手工业非常发达。捺钵作为一种皇家制度,既要使其保留契丹人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同时又要满足以天子和贵胄为主体的中央机关相对的舒适与安逸,确保捺钵活动的绝对安全,因此,依托城市、靠近城市安排捺钵活动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且,长春州作为当时的军事要塞和军事基地,置有强大的军事协调指挥机构,可为天子捺钵提供坚如磐石的安全保障。据统计,天祚帝、道宗、圣宗和兴宗四位辽帝先后 15 次驻蹕长春州。可见,强大的军事保障和后勤保障,是辽帝选择在查干湖畔进行“春捺钵”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政治统治的优势。当时松花江北岸属女真部落统治范围,查干湖位于松花江南岸,在此地行“春捺钵”,显示了其政治统治的范围遍及松花江两岸的广阔区域,相当于一种权势的示威;三是制度的优势。依照辽国法制,辽代新皇继位,得到的不仅是一脉江山,天子即位,要为其单独设置官府,分一些州县,划拨一些部族归其直接统领。据《辽史》“本纪”记载,“兴宗重熙八年(1039 年)十一月,城长春”。圣宗时,长春州设立,至兴宗,在塔虎城老城基础上重新改造,所以,至今民间还有辽帝圣宗君临塔虎城,以及在塔虎城建有金銮殿的说法。由此可推测,塔虎城至晚始建于 1039 年,而这个时间,应该是松原市、前郭县建立城市的起点、元年。

通读全书,我认为,这几点也是旭光近年来耗尽心血得出的最显著的研究成果和最突出的学术贡献。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 1 万 3 千年前,“查干淖尔人”就在查干湖畔逐水而居,生息繁衍。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这片水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博大辽阔的水域为历代英雄霸主提供了叱咤风云的政治舞台,演绎出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故事。作为先人们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重要水源之一,查干湖历来就是兴农兴渔和水上交通的物质基础,到了现代,经过开发和改造,查干湖水资源日渐丰富,灌溉效益显著增强,为松原赢得全国著名的“粮仓”和“鱼乡”之名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异军突起,查干湖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同

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辽阔浩瀚的查干湖还给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一直对江河湖海等各种水域有着十分浓烈的崇拜意识，在查干湖，延续至今的“祭湖·醒网”仪式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尊崇、对生命的敬仰。查干湖空阔、粗犷、质朴、沉静，向世人展示出一种最原始、最质朴的美，而这种原始的、不经雕琢的自然之美往往更具震慑力，令人倾倒、令人痴迷、令人流连忘返。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大多喜欢追寻圣湖的足迹，行吟泽畔，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词赋和书画墨宝。这些围绕着查干湖产生的诗文词赋、楹联碑刻、神话传说等，历经千百年的融合，渐渐积淀成独特的查干湖文化，成为“松原文化”中最具文化底蕴、最具民族风情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人们对查干湖关注的目光大多集中在远古的“查干淖尔人”、旖旎的自然风光和神秘的祭湖醒网等一系列涉及历史、旅游领域等方面，旭光同志却另辟蹊径，从考古依据入手，从“捺钵”文化切入，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寻找脉络、寻求答案。

“春水”、“夏凉”、“秋山”、“坐冬”，一直以来，这些在辽代帝王中沿袭了数辈的捺钵制度传递着不可言说的神秘。捺钵，于皇家，展示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霸气，是皇家尊严唯我独尊至高无上的政治智慧；于群臣，代表着一种奢华的荣耀、一份浩荡的恩赐。可是，捺钵，仅仅是辽代帝王行乐狩猎的简单举动吗？仅仅是一次次犒赏三军游山玩水的普通出行吗？或者仅仅一种是“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吗？在多年对相关历史资料的研读、整理过程中，旭光同志还原了“捺钵”制度清晰的历史脉络和真实的文化内涵，大胆地揭开了辽帝“捺钵”制度的神秘面纱——在辽金时期，“捺钵”这一行动的背后，还有更为广阔的政治背景和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帝王对统治地普通的政治巡视和权势震慑，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思想的交融、文明的汇聚，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吸纳乃至传承壮大的过程，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汇聚、碰撞与升华。所谓“春水秋山”，辽帝的捺钵地通常因季节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驻蹕之地，其中，春捺钵的驻蹕地与水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最忌停留在表面，做做表面文章走走形势走走过场是

研究历史文化的大忌。如何让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如何让历史文化如凤凰涅槃般焕发出更生动、更立体、更具力量感与时代气息的文化底蕴?这一直是我市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和共同破解的难题。这一点,旭光同志在书中也提及到,“捺钵”文化,应该转化成其他类型的文化产品,使其以更广博、更生动、更立体的方式进行传播和传承。

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一些文化研究成果正在进行由精神领域向物质领域的深层转化。松原的宣传文化部门从查干湖这片古老的水域延展开去,让这片先民生息之地、兵家必争之地、皇家捺钵之地渐渐为人知、为人识。文化与经济的和谐共生,不仅唤醒了一湖圣水,更带富了一方百姓、拉动了一方经济。如今,源于史前、盛于辽金、传承至今的“查干湖冬捕”,以及由此衍生的全鱼宴、蒙古族歌舞、“祭湖·醒网”、敖包祭祀等已经成为松原响当当的文化品牌,成为松原走出吉林、走向全国的代名词。“唱历史文化大戏、做经济发展文章”——这一举动不仅让松原千百年来宝贵的精神财富得以传承,而且为松原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无限的发展空间。

研究辽代历史、解读“捺钵”文化、探究查干湖与辽帝“捺钵”的渊源……从某种角度讲,这些工作也许不是旭光同志的份内之事,也许不在他的职责之内,但是,对一名痴爱着家乡文化的学者来说,这也是他必然担当的使命,必须承担的责任。人,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应该有一种责任感,这与职位无关,与年纪无关,与所处的环境无关,这是一种情怀、一份责任、一种使命、一种信仰、一种精神……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在繁冗的工作之余,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这种寂寞和艰苦的滋味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可是,那其中的喜悦与酣畅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旭光同志的这种执着和勤奋,让人敬仰,让人敬重!

松原有旭光这样的学者,逝去的历史就不会被时间的风尘淹没,过往的岁月就会寻到扎实的落脚处。《查干湖畔的辽帝春捺钵》一书的付梓出版,标志着松原“捺钵”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的高度,旭光同志无疑是一面旗帜,这一点,并不为过,

而且,旭光同志当之无愧。

在松原,还有许多专家、学者甚至平常百姓,如旭光同志一样默默关注、关心着松原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艰辛的积累、执着的坚守和无私的传承,为今天松原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有力的理论依据,积累了厚重、丰富、翔实的科学史料,完成了松原历史文化全面、系统的原始累积,为未来松原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开辟了一条创新与继承之路。

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清晰地仰视,一座精神山峰的真正高度。

从我为什么要研究春捺钵谈起

李旭光

无论是史学工作者,还是非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常常会问起我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要研究春捺钵,写春捺钵。因为对于专门从事史学研究的专家而言,我等于是在从事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工作;而在那些更多的、没有涉足历史研究的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看来,我花费这样多的精力去尝试学术方面的问题,则无疑是一种异想天开。

捺钵,契丹语,是契丹天子及中央政府,皇室成员,朝官及州军城官,部族首领等四时迁徙的制度。春捺钵时,契丹的政治精英一边处理军政要务,一面从事带有生产、习武、节庆性质的渔猎活动,政治中心转徙随时的迁徙到驻蹕地“鸭子河冻”。这时的鸭子河冻,不仅仅是行营、行宫、行在,而且还是囊括全部生活要义的皇都和皇城。因为每年的四季都要周而复始地这样工作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捺钵,是辽代捺钵制度文化的专用语。

捺钵制度,在辽代是营卫制度的核心内容。这种制度,将一年四季的四时迁徙流动,因宜而治,逐水草而居固定下来,迁徙时间,驻蹕地点,参与人员,营盘的格局,四时所侧重的内容等,完全制度化。既不同于早于和晚于契丹政权的其他王朝的游幸现象,又带有鲜明的草原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是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辽圣宗一朝,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辽宋息兵罢战,结为兄弟之谊。捺钵的驻蹕地也由常年征战所影响的漂泊不定状态而相对地固定下来。根

据傅乐焕先生的研究,《辽史》“本纪”和“游幸表”中所记载的春捺钵,主要盘桓于“东北组”和“西南组”两个地区。东北组的驻蹕地主要在鸭子河、长春州、鱼儿泺、长春河这由四点所穿成的一线,而四点一线的共同之处,都是围绕一个水字进行,即春水之行(见《辽史丛考》“四时捺钵考”)。

但是在史学界,在考证上述东北组捺钵时,人们对于一些地名和江河冻淀的认定不尽一致。这固然是由于史料严重匮乏,考古发现有限,也由于一些史学界的专家没有精力长期从事和关注于某一特定段代史、特定地方史的研究,这就给地方工作的同志研究当地历史文化创造了机缘。当然,地方同志的这种研究既离不开既定的研究格局,又理所当然地要主动地接受业内专家的指导。

另一方面,对于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往往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以五千年中华民族其他王朝的标准去看待契丹民族的捺钵现象,从而低估和误判了契丹捺钵文化的价值。而这种低估和误判,要害在于造成对契丹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当地历史地位的漠视以致贬低,进而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地域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与开发利用。

我虽然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远离学术研究领域的党务和行政工作,由于对历史上一些经典著作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到一个部门从事管理工作之后,有了一些可以自我支配的时间,开始从事文学方面的创作,而这期间,主要的是在浏览历史典籍中,采撷历史遗珍,借助历史这面镜子,透视当今社会现象,进行一些带有思考性质的散文、随笔、札记的创作尝试。这些尝试,今天看来,无疑地从另一角度看是为春捺钵方面的历史研究做了必要的准备。

在回答一些同志,包括记者的提问时,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我之所以从事春捺钵的研究,主要因为我是松原人。我是把春捺钵作为地方同志研究松原地方史、研究地域文化,探寻松原发展根源及其在历史上所具有的地位等角度出发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试图通过我的考察论证,最终把扑朔迷离的春捺钵地名、水系加以破解,进而找到与当今松原的地名、水域的关系,使人们看到历史的真相,不再为这类本应由地方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同志完成的事情再浪费史学专家和后人宝贵的时间。总之,是把春捺钵与松原一直都放到一起去思考和研究,以

春捺钵的研究为己任,甚至是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课题研究来对待的。

在治史之外,我也曾试图将我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做出宣传,使人们纠正对春捺钵的误判,包括不再以肤浅、武断,甚至是一些偏见和主观的臆断去理解春捺钵。而如果这一项工作真正做好了,就自然而然地会促进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

2008年3月,我曾撰写《辽代“捺钵”的性质及其他》一文,在一些报刊发表并收入文集《方舟·方舟》中。所用材料主要来自《辽史》。2010年,媒体公布了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成果,我市查干湖的西岸和东岸相继发现了一些春捺钵的遗址。我以遗址发现为线索和契机,更深入地考察论证了春捺钵问题,当然,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依然主要是与松原地域有关的问题。这次集中的研究断断续续地从2010年9月开始至今。开始曾想的很简单,以为会在一两个月内完成。而实际工作起来才真正地感到春捺钵课题的博大精深,才体会到开展这方面研究的难处。以致于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一直无法撂下。与2008年不同的是,我开始拓宽视野,把《辽史》与其它典籍,与古今学者的辽史研究结合起来,把自己躲起来单独地研究与向专家求教结合起来,把浏览典籍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使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困难逐步得以克服和解决。

回顾这一阶段的学习、研究、考察,我在春捺钵(主要是东北组松原地)的研究方面,主要在以下七个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1、为什么认定辽帝把东北组的春捺钵驻蹕地确定在查干湖一带。大体上有六点理由。第一点,据《辽史》“地理一”记载,“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挹鲁河也因长春州而诏改为长春河,应取其永为春水之趋的意思。长春州即因春捺钵而建,便赋予了其节制州的职能,设置了东北路统军司,协调包括泰州、宁江州、龙州黄龙府在内整个东北路的军事工作,是军事大区、屯兵基地,作为镇抚女真、室韦的军事要塞。而且,考察长春州时应把长春州与宁江州联系在一起来看。长春州在北流松花江的西岸,距松花江仅十几公里;宁江州的古城伯都讷在北流松花江的东岸,距松花江也十公里左右。两个城市相距不到50公里。据洪皓的《松漠纪闻》,宁江州也是辽帝春捺钵之地。“每春冰始泮,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钓鱼,放弋为乐”。可以认为,在北流松花江两岸所夹之江段,应是当年鸭子河的主

要钓鱼江段。一江襟带的两州,所执行的都是一个共同的任务,即拱卫辽帝的捺钵活动,其中所隐藏的重大主题就是为了备兵女真、室韦。值得注意的是,长春州始建于辽圣宗太平二年,公元1022年,宁江州则始建于道宗清宁四年,公元1058年(《辽史》“地理二”：“宁江州,混同军。观察。清宁中置。初防御,后升。兵事属东北统军司。统县一:混同县。”另见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辽代宁江州考》:“从宁江州‘清宁中置’,以及‘清宁四年,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的记载来看,可以推知,宁江州是清宁四年,公元1058年,在鸭子,今第一松花江西段、混同,今第二松花江二水之间建置的。今伯都讷古城,正在第一、第二松花江之间,即辽代鸭子、混同二水之间。”),两州之设相距36年,间隔有兴宗皇帝。以圣宗重视地方政权建设而未置宁江州,道宗相对来说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少有作为,而置宁江州,说明历经三十余年,女真的势力不断壮大,宁江州的区位在防御女真方面地位上升,促使道宗皇帝下决心设置宁江州。第二点,从现代地理的角度来看,查干湖是汇集天下四方来水的不竭之泽。松原地区东南有长白山,西北和东北有大小兴安岭,整体上来自南、北的山脉所形成的河流,最终都在松原地区完成交汇。其中来自西北的洮儿河的干流与霍林河最终汇入并消失在查干湖,丰水年份注入松花江和嫩江;来自南北的北流松花江和嫩江在松原市前郭县的平凤乡汇流,注入东流松花江。在丰水年份,无论是大小兴安岭还是长白山,洪水下泻时在两江汇流处都经常发生顶托,而使一部分洪水分流注入查干湖。在这种情况下,以查干湖为枢纽,四条江河实现了沟通,从而保证了只要东北地区的南部,或是北部山脉雨水丰沛,就可以使查干湖的水域维持一定面积。而南北的丰歉年互补,就使得查干湖的水域可以相对衡定在一定的水平。这当然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松原作为水乡、水都的优势。也许正是这一优势,使松原成为松辽盆地石油地下埋藏丰富的重要原因。而在千年之前,辽帝就已经在实践方面运用了这样的优势。第三,《洮河防导计划书》的发现。当年贾敬颜先生在考证挹鲁河(长春河,今洮儿河)最终消失在那里时,所依据的就是民国六年,洮昌道赵师侨主持编制的《洮河防导计划书》。该计划书是在充分寻访调查洮河霍河水患,运用现代测量技术进行实地勘察基础上形成的。计划书还附有“洮河下游形势图”、“洮河流域略图”、“测量洮河经线水准表”。从该计划书的文字表述和图表所示可

以看出,洮儿河在从白城流出后分为两支,其中的主流称为洹河。洹河在通榆境内与霍林河汇流,注入并消失在查干湖。(查干湖当时称为叉沽挠泡子或查干挠泊。)洮霍两河的下游溢出河道,并最终消失在查干湖,是使查干湖被定为堰塞湖的主要理由,而堰塞湖又是洮霍两河形成内流河的主要原因。形成两河外溢的主要原因是海拔所形成的降比不够。因为在大兴安岭进入洮南平原之后,海拔迅速下降,比降由 16.6%骤降至 0.2%,这也是这一带连年水患,湿地遍布,成为契丹二十部族牧地(见《辽史》“地理一”)的主要原因。第四,鸭子河、长春州、鱼儿泺、长春河的大量同组出现。《辽史》“营卫志中”说,春捺钵,“曰鸭子河泺”。这一记载看起来很离奇,使人费解。傅乐焕先生早就注意到这一点。离奇之处一,“以《本纪》之文,二百年中‘鸭子河泺’竟未一见。”(《辽史丛考》“春水秋山考”41)。离奇之处二,将鸭子河与泺连在一起。河本为流水,而泺显然是止水,湖泊。可以推测,鸭子河泺应为鸭子河之侧的湖泊,或是与鸭子河相连、相接的湖泊。就我个人理解,所谓鸭子河泺之泺,更倾向于与鸭子河相连接的湖泊。因为全国各大淡水湖大多如此。从这四个同组出现的捺钵地名来看,已知的为长春州,据李健才先生考证为位于前郭八郎西上台子的塔虎城;已知的为鸭子河,据贾敬颜先生考证为北流松花江,特别是扶余五家站至前郭平凤乡汇流前的一段;已知的为长春河,据贾敬颜先生考证为洮河的主流洹河,以及汇入查干湖之前加入其中的霍林河的尾间。当我们了解了四个地名的三个之后,鱼儿泺也就自然浮出水面了。傅乐焕先生在《辽史丛考》“春水秋山考”(41)中说“鱼儿泺《地志》未详。其名每与长春河连出。……知在长春河附近。”又说:“鱼儿泺即鸭子河泺。今观其水,当洮儿河(长春河)之尾间,去入松花江(鸭子河)之处不远,就其源而言,自为洮儿河之泺,就其流而言,亦可谓松花江(鸭子河)之泺。然则鸭子河泺一名之所由生,岂亦犹系于蠡于长江,列长山于渤海者耶?(48)”傅乐焕先生的这些理论上的精妙推导,结合《洮河防导计划书》及贾敬颜先生的扎实考证,可以基本上认定,查干湖即鱼儿泺。第五点,钩牛鱼。牛鱼,《本草纲目》说,“牛鱼出于女直混同江”;《东海志》:“今出混同江……”;《辽史拾遗》:“牛鱼出混同江……”。可见,牛鱼是混同江特产鱼。《演繁露》:“挹鲁河钩牛鱼,北方盛礼”。从程大昌的《演繁露》来看,牛鱼不仅产出混同

江,还产于挹鲁河(长春河、洮儿河)。混同江的范围很大,而挹鲁河则单指洮儿河。《演繁露》又说,“挹鲁河东与海接。”这说明,同样与海接的混同江,与东与海接的洮河,在松原地的查干湖汇合之后,成为牛鱼回流、产卵之地。根据典籍和相关资料考察,牛鱼是回流内河的海鱼,今名鲤鱼。在松原,自清代以来就有专门为清帝捕鲤鱼的皇家专门机构和由京城调派专门捕捉鲤鱼的渔民,有“鲤鱼圈”、“鲤鱼贡”的大量记载与传说,许多老年人都见过在满大街百姓热热闹闹簇拥之下大队车马、保镖护送车身裹着黄绢进京向清帝晋献鲤鱼的万人空巷情景。所以牛鱼、鲤鱼,及由此演绎出的“头鱼宴”等,也说明春捺钵地在松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演繁露》中所指出的“挹鲁河东与海接”,这一点也很重要。“东与海接”,证明挹鲁河(长春河、洮儿河)与海相通,且在其西侧,这与贾敬颜先生的考证,与《洮河防导计划书》及附图所示的方位是完全吻合的。而且,《演繁露》中还说,“思乡人武珪在北十余年,以善歌舞隶帐下,故能习北事详悉。凡其所录,皆珪语也。”就是说,由武珪所描述道宗与母亲挹鲁河钩牛鱼,完全出于实地参与和所见之后的记载,这与民国初年洮昌道赵师侨在踏察河川,寻访水患的实地考察,同出一辙,当为可信。第六,春捺钵遗址的发现。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查干湖岸及花淖湖边春捺钵遗址被发现,使其成为吉林省考古工作的十大发现之首。这一发现在查干湖西岸继有四处。查干湖周边遗址的发现,当然不能排除在其他地区,在松原的别的地方仍会有春捺钵遗址被发现,但已经足以证明春捺钵地在松原了。

2、考察了辽帝在松原捺钵的主要活动内容并做了相关统计。从我依据《辽史》“本纪”所做出的统计,春捺钵地松原期间,辽帝及中央政府所行使的是非常完整的职能,由于史料过简,只能做粗略统计。除掉天象方面的记载外,包括两位帝王道宗、天祚的权力更迭都在捺钵地完成。其中任命重要官员 27 年次,发布诏令 22 年次,录囚 8 年次,会见宋夏使节和五国、女直等属国 53 年次,振饥贫 14 年次,处理财政问题 6 年次,军事斗争 7 年次,讲经议政 3 年次。其中处理外交和民族事务为最,其次是吏治、司法、民政、军事斗争、财务等方面问题。

3、考察了松原地区辽帝春捺钵莅临的起止时间、次数,进入捺钵地之后的迁徙。从我考察的结果来看,辽帝莅临松原春捺钵上起于辽圣宗太平二年,公元

1022年。这年的正月如纳水(嫩江)钓鱼,二月驻蹕鱼儿泺(查干湖),三月如长春州(塔虎城);下止于天祚帝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这年的正月,如春州。其间历圣、兴、道、祚四帝,计92年。大致地说,从1022年算起,时间已经穿越了千年;而92年的盘桓,近百年间松原的头上都罩着帝都的光环。所以可以说松原是“千年捺钵地,百年辽帝都。”在进入捺钵地之后,还有流动和迁徙,可查的共70次,只记一地的26次,两地的28次,三地和三地以上的16次。这种驻蹕地内的迁徙,一方面说明松原境内可用作捺钵的地方比较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可能受资源环境变化的影响,尽管春捺钵的内容是不变的,而钓鱼猎雁的地点会不断地做出调整。而这种驻蹕地内的迁徙和流动,也为更多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4、考察了春水之趋中诸水系的关系,特别是证明了洮霍两河注入查干湖的历史事实,使鱼儿泺(查干湖)与长春河、霍林河、鸭子河(北流松花江)、纳水河(嫩江)的关系找到了证据。这种证据,最重要的是海拔和降比所促成的嫩江与松花江在松原汇合,洮霍两河最终注入并消失在查干湖,以及在丰水年份,以查干湖为枢纽,松嫩之水倒灌,抑或是洮霍之水进入松嫩两江。

5、考察了辽帝春捺钵松原一组的编组中所发现的地名。通过考证可知,辽帝春捺钵松原一组计有39处,主要集中在一江(混同江)、一州(长春州)、一泺(鱼儿泺)、一河(长春河)这四地。江、州、泺、河的次序排列,是春捺钵中钓鱼转入猎雁内容先后顺序所决定的。而且,江、州、泺、河的排列,也是由东及西的方位排列,自正月二月至三月的时序排列。从统计可知,江、州、泺、河四地的排列,是东北组捺钵地中最稳定的一组,是春捺钵地的基本面,表明在正常情况下,只此四地,即可完成春捺钵的全部内容。然而在有的情况下,四地以外,或是四地不完整出现时,会涉及其他地名的记载,这样的记载,据我的理解和考察,多数属于四地之外的另迁,如黑水泺、纳水河、黑龙江。黑龙江,纳水(嫩江),当属东迁、北迁。黑水泺,可能是大安月亮泡。也有一些地名,当是上述四地地名的别称,或四地内较小区域地名。如“春水”,当是上述四地的代称,“东幸”亦然。“中会川”,已有专文考察,即韶阳川,韶阳军的军营,在松嫩三江交会处(从军事方面角度,据水陆要冲,当是驻地首选),而“东川”,亦应是中会川。“春州北淀”,“双子淀”,“双泺”,显然都在春